**体育教学的护航人-黄德鹏、严育健的入党故事**

共产党人，有着崇高信仰。因为信仰，所以能够脱离世俗的趣味，战胜一切艰难困苦。正如革命烈士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写道，“清贫，洁白朴素的生活，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”。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，有不少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共产党人，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路上，最终背离自己的原生家庭和阶级，积极投身到革命的烘炉中。我校体育学院退休教师严育建、黄德鹏夫妇俩，出生于地主剥削家庭，但他们在成长中逐步认识到，只有共产党，才能救中国，在信仰追求的路上始终执着追求，最终双双成长为共产党员。

1933年12月，黄德鹏出生于四川省新都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。黄家是一个大家族，叔伯兄弟众多，仅她父亲名下就有土地294亩，以剥削佃租为生，过着奢华的生活。但黄德鹏从小目睹的就是算计与暴力，一直生活在恐惧不安中。她的父亲没有儿子，只有两个女儿，在旧社会，没有儿子会被人看不起。于是他父亲收了一个养子，后来在国民党黄埔军校任教官。为争夺家产，这个收养的大哥联合黄家其他叔伯，殴打养父，并扬言谋划害死黄德鹏姐妹。这种自私、残暴、腐朽的的旧社会家族关系，在幼小黄德鹏心里留下深刻的烙印，她是恨透了这种生活。

1948年秋，黄德鹏去到省城成都念初中。在这里，她时常看到在街上横行霸道的美国大兵，流落街头奄奄一息的难民，混乱的社会秩序让黄德鹏感到迷茫，她看不到个人前途，感觉生活紧张到自己难于呼吸了。 在民国腐败的统治下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社会生态极度脆弱。民间帮派林立，匪患横行，人民生活毫无安全保障可言。在那个年代，普通人为了自保，就不得不加入帮派组织，寻求庇护，黄德鹏父亲就是当地民间社团组织的袍哥大爷。同样出生在地主家庭、后来成为黄德鹏丈夫的严育建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，“自己家中的财富，在一次土匪的抢劫中，被劫掠得精光，除了身上穿的衣服，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了”，“那时，父兄们在一起讨论最多的，就是家庭前途和出路问题”。

在黑暗、压抑的社会环境中，共产党带来了希望的曙光。在进步师生的带动下，黄德鹏也积极地参加到游行队伍中。成都解放前，国民党各单位乱如一锅粥，黄德鹏也一度辍学，直到解放后，她才在党和同学们的帮助下，筹集到学费、生活费，又能继续学业。1950年5月，在成都九中读初中的黄德鹏成为了学校第一批团员。共产党恩情就此在黄德鹏的心灵里埋下了种子，直到三十多年后，她在入党申请书中还饱含深情地回忆道，“解放后，我的生活费全靠组织和部分同学的帮助，就这样在党的教育和关怀下读完了中学和大学，因此，我完全是党一手培养成人，我的一切都是属于党。”

黄德鹏从小就热爱体育运动，又佩服于鲁迅先生学医强健国人体魄的理想，立志要洗涮列强蔑称中国人为“东亚病夫”的耻辱，于是她把充沛的精力集中到学习上，成绩也越来越好。高考时，她选择了体育和医学两门学科的契合领域，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体育大学的解剖学专业。大学毕业后，她接着攻读硕士，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体育专业硕士生，随后留在北体解剖教研室任教。

在北京体育学院工作时期，她与时在国家体委工作的严育建结婚了。严育建出生于1929年7月，四川渠县人，解放前夕读中学时期，就追求光明，向往革命。1949年家乡解放后，积极参加新中国举办的干训班学习，主动投身到火热的新中国建设中，先后在垫江县贸易公司、粮食公司工作，曾任垫江县粮食加工厂的领导。1954年7月，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，考入北京体育学院学习，毕业后分配到国家体委工作。婚后，夫妻俩工作上尽心竭力，政治上也积极向党靠拢，双双向党提交了入党申请书，虽然家庭成分阻碍了两人入党的步伐，但夫妻俩下决心要用行动来向党表达自己内心的热爱。

六十年代，中苏关系恶化，国内又连年遭遇自然灾害，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。为响应党实行精兵简政的号召，1963年，严育建主动申请调往最艰苦的地方去，妻子黄德鹏与严育建一起回到家乡四川渠县从事商业工作，这一干就是15年。回顾那段历史，严育建在入党志愿书中这样回忆，“我对党和党的事业是热爱的，能严格要求自己，听从党的召唤，服从党的安排，不讲金钱，党指向哪里就奔到哪里，为了党的利益，不顾牺牲个人利益”。

虽然离开了自己擅长的专业岗位，但夫妇俩并没有放弃自己对体育事业的热爱，而是在劳动实践中来锻炼自己，不断充实自身的理论修养。1978年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，党确立了号召科技人才归队的政策。为响应党的号召，严育建、黄德鹏夫妇又毫不犹豫地放弃已经熟悉的行业，回归到体育教育事业中来。1978年11月，夫妇俩被调至达县师范专科学校，担任解剖和生理课程的教学工作，后因该校体育专业停办，1982年8月，严育建、黄德鹏夫妇主动申请来到江津师专（今重庆文理学院）从事教学工作。

在来江津师专前，严育建就已饱受肝病折磨多年，身体极端衰弱，已不能从事教学工作，黄德鹏身体也不好，时常性犯下肢关节炎以及神经性头疼。但夫妻俩始终放不下自己所钟爱的体育事业，始终想多做点事来回报党的恩情。正如严育建在入党申请书中所说：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我们看到了希望，我们和其它知识分子一样，重新回到了教育战线并搞上了自己的专业。我在心里对党万分感激，暗自下定决心，我们将永远跟党走，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。严格要求自己，努力做好工作，争取早日实现多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崇高理想加入党的组织，做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。”

黄德鹏也在入党申请书中这样写到：“我对我的专业是热爱的，我对党是热爱的，既然她们现在都需要我，不管难度多大，我坚决响应党的号召，归队体育事业培养更多人才”。夫妇俩在病魔面前没有丝毫退缩，黄德鹏一直咬紧牙关，奋战在教学第一线，丈夫严育健病情严重，肝疼得时常直不起腰，他就一头扎进体育资料的整理工作中，为体育教学做幕后工作。夫妻俩相互扶持、相互鼓励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，让他们有坚持工作、克服病魔的莫大勇气。

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培养的第一批解剖学硕士研究生，黄德鹏不仅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，还有强烈的育人使命感。她在心里总是暗暗叮嘱自己，要在专业上不断学习新的科学知识，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武装学生，为党培养更多的体育专门人才。为推动教学改革，黄德鹏撰写了大量的论文，病中的严育建废寝忘食地为妻子收集整理资料。她认为，解剖是一切体育专业的基础，只有真正了解了解剖知识，才能从根本上分析技术动作，从而提高运动水平。在当时，学校 “跑道还是煤渣跑道，球场还是泥土地”的艰苦条件下，黄德鹏撰写了“解剖学联系运动技术教学初探”“采用启发教学培养学生能力的体会”“推铅球动作的生物力学分析”等多篇学术论文，还参与编写我国第一套全国体育专业解剖学教材《正常人体解剖学》，为学校的体育专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黄德鹏总忘不了自己是党一手培养成人的，她也一直秉承“对待学生要像子女一样关心和爱护”的教育理念，在教学中严格要求，不近人情，但在生活中，却对学生关怀备至、无微不至。她教出来的学生，很多后来又成为了她的同事，成为学校体育教学的骨干。现我校体育学院院长李旻就曾是黄德鹏的学生，他记得“黄老师上课从不迟到、早退，也不拖课、缺课，哪怕身体有病有伤的情况下，她仍然坚持上课。对学生无限热爱、关怀、体贴又严格要求，在学生中威望很高，黄老师说的话学生们都能听，后来毕业多年的学生还经常回星湖去看望她”。曾经共事的同事、体育学院退休教师陈凤凌回忆说，严育建、黄德鹏夫妻俩有一种“舍小家为大家”的情愫，他们忘我工作的精神是至今都难以忘怀的。

生活和工作逐步安定下来，但严育建、黄德鹏夫妇俩的内心却并不平静，入党的梦想一直萦绕在心间，成为两人最期盼的政治夙愿。1982年11月，严育健和黄德鹏夫妻俩同时向党递交入党申请。严育健入党申请书中深刻剖析自己，“我进入革命的第一步，就必须彻底背叛反动的地主阶级家庭，并自觉地改造世界观，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”。黄德鹏在申请中动情地写道，“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，向党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书，这是我第五次递交入党申请书”，“千言万语难以表达我对党的感激心情，历史经验告诉我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出路，我要永远跟党走”。

1983年12月，经组织批准，严育健光荣成为一名共产党员，实现了他一生赤忱的信仰追寻。一年后，黄德鹏也被批准成为共产党员。虽然夫妻俩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，但他们在生活实践中，看清楚封建剥削制度的黑暗落后，逐步认识到共产党的事业的光明伟大，从而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。正如严育健在志愿书中所说，“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，出生不能由自己选择，道路是可以选择的”，看惯旧社会的混乱秩序和世态炎凉，新中国的勃勃生机让严育建等出生于旧社会的亲历者，感触良深，“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年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，政治上稳定，经济上发展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，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”，“同志之间互相信任，团结友爱，并肩战斗，一切都使我认识到，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中国才能繁荣富强，才能有前途。我感到能成为党的一员，会是无尚光荣的”。

长期带病工作彻底透支了身体，1987年4月，在入党四年以后，严育健带着他对党无限的热爱，永远离开了他的家人、学生、同事和朋友。黄德鹏在悲痛之余，矢志不忘为党的事业培养体育人才的责任，即便在退休之后，还返聘回教学岗位，继续为她的学生当“妈妈”。2013年12月，黄德鹏在弥留之际立下遗嘱，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第三军医大学做教学解剖用，为她所钟爱的事业和信仰，发挥最后一缕光热。